

文化统战、知识生产与场域重构：抗战时期夏衍在香港的文艺实践 ——以其报刊出版、编辑策略为中心的考察

□吴婧雯¹ 孙月梅¹

(1.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作为左翼文化的媒介实践者，夏衍在全面抗战构建的跨区域文艺统战网络，呈现出战时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形态询唤的特殊范式。本文聚焦其1941年香港沦陷前夜与1946年战后重返香港两个关键时段，通过实证考辨《华商报·灯塔》副刊的编辑策略、《群众》周刊文艺栏的组稿机制，以及《春寒》《法西斯细菌》等战时文本的生产，揭示夏衍如何借助报刊媒介在殖民都市香港构建离散型文化空间，完成无产阶级文艺话语的在地转化，并通过报告文学与历史剧创作实践重构革命现实主义的美学范式。

[关键词]战争时期；香港文艺活动；夏衍；编辑报刊

Cultural United Front,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Field Reconstruction: Xia Yan's Artistic Practice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its strategies for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publishing and editing

□WU Jingwen¹ SUN Yuemei²

(1.School of Media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As a media practitioner of left-wing culture, Xia Yan, in the cross-regional literary and artistic united front network he constructed during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resented a special model of intellectuals' participation in ideological inquiries during the war.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wo crucial periods: the eve of Hong Kong's

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文化建设视阈下的甘肃抗战文艺运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3QN023。

作者简介:吴婧雯，女，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博士副教授；孙月梅，女，缺职称。

fall in 1941 and its return to Hong Kong after the war in 1946. Through empirical examination, it examines the editorial strategies of the "Lighthouse" supplement of the Huashang Daily, the contribution solicitation mechanism of the literature and art column of the "Masses" Weekly, as well as the production of wartime texts such as "Spring Cold" and "Fascist Bacteria". Revealing how Xia Yan utilized the media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o construct a discrete cultural space in the colonial metropolis of Hong Kong, complete the local transformation of proletarian literary and artistic discourse, and reconstruct the aesthetic paradigm of revolutionary realism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reportage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drama creation.

[Key words] War period; Hong Kong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Xia Yan; Edit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委派或指示下，夏衍作为文学运动发起人在香港开展相关的文艺统战工作，他主要通过与内地各文化团体、出版单位、教育机构保持互动往来；邀请其他文化人来香港办刊、办报、出版图书；有意识地激发本地民众的民族意识，最终在战时的香港建立了“新兴阶级”的文艺阵地。夏衍通过组织或参与这些行之有效的文艺活动在香港文化界各个阶层营造出良好的氛围，在香港建立了革命性的文艺阵地并构筑起坚固的文艺战线。夏衍凭一己之力将左联时期的阶级意识和集体主义、抗战初期持续升温的民族意识以及发展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根植在战争期间的香港文化界。

一、编辑文艺副刊策应战事

1941年5月，直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等人组成文艺、学术、新闻组。邹韬奋、范长江、夏衍等负责创办《华商报》。对于它的命名，夏衍回忆，当时是“为了尽可能让报纸能公开发行，邮寄到南洋各地，廖承志同志想出了用《华商报》这么一个报名，理由之一是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文田的确是商人；其次是用这个名称，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看了也不会感到害怕^[1]。”《华商报》的办报方针很明确：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是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批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

夏衍在《华商报》的工作是每月写几篇社论或时事述评之类的文章并主持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灯塔》。在发刊词中，对于这个文艺副刊的定位是没艺术化的综合副刊，既不想“嬉皮笑脸插科打诨”也不想“扯长了面孔说教”，它是我们读者在一天工作疲劳之后，可以不费力气地在灯下阅读的读物，要做到的尽管不一定能够滋养和振奋，但也未始不足以爽气和清心。后来更名为《茶亭》“以香港普通读者为服务对象，既迎合了小市民的趣味，也兼顾了大多数底层百姓的品位，综合性地呈现出一种新的文艺潮流^[2]。”夏衍选择连载了茅盾的长篇笔记《如是我见我闻》、艾芜的长篇小说《故乡》、巴人的长篇小说《沉潭》等作品。11月中旬《灯塔》用了大量篇幅，刊登柳亚子、金素琴、风子、胡风等人的诗文、周恩来的《我要说的话》、郁达夫的《写在郭沫若五十诞辰之前》等文章。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商报》于1941年12月被迫停刊，1945年《华商报》筹备复刊，翌年一月四日改为日报。1946年10月30日，夏衍与潘汉年夫妇一起飞往香港，主要是对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参加香港文艺界的政策研讨会。1946年以后夏衍再次回到香港担任《灯塔》的编辑工作，特别是北平解放后，夏衍将北平的政治情况、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消息改编为“本报北平专稿”

或“本报记者北平电”在《华商报》上发表。因为这时，不单港澳，连东南亚以至欧美等国的华裔、华侨都渴望知道新北平解放区的消息，《华商报》及时地向他们传来了讯息。作为有着明确政治倾向的文艺副刊，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指引文艺思潮的发展方向的文章。无产阶级文艺的政策随着夏衍编辑刊发与之相关的文章在港澳地区大范围传播和扩散，有力地推动了香港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

1941年5月—12月8个月时间，夏衍同时还担任香港版《大众生活》副刊的编辑工作。凭借多年新闻记者的阅历，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副刊的主题：“不脱离现实的抽象，而是直接反映和刊载抗战建国以及大时代有关的知识^[3]。”

在这些短小的时评里，不乏夏衍呼吁团结起来反抗侵略的文章：如号召新闻记者以笔杆为武器，进行正义的斗争，正面宣传抗战现阶段每一个新闻记者都应认识自己的地位，善用自己的武器。科学昌明之后，飞机、文化、广播、电报、照片传送、高速度的轮转机、连锁制的新闻托拉斯迅速而普遍的发行网，形成了文化上的战争机构。目前的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阶段，天真的读者对于用铅字排印在纸上的新闻和议论毫不怀疑的盲信，在他看来“中国新的新闻学事业同时面对三个强大的敌人，第一是封建性的笼统、独断、有闻必录、不负责任；第二是煽情（sengationaligm）和胡诌（demagogism）直接译作恶意宣传；第三是封锁与统治。由于非科学的笼统和专制主义的独断与美国黄色新闻传染过来的煽情主义恶意宣传的结合，中国的新闻纸反映出一种独特的恶辣、残暴、卑怯、低级趣味和不精密，不确实的格调的新闻纸。新闻记者把握着这一个武器而不是自由意志的运用，但要认识到作为拿着武器的人，有选择有作用为正义与真理，兼顾着无可推脱的责任^[4]”“当记者的笔端一接触到这些的时候立即有留下一块空白的危险，只许忧别人而不许忧自己的宣传政策”^[5]，另外不忘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人民的力量，他们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强有力武器“中国的武器不如日本不容否认的，但有着一种更为有力的抗战武器—全民族的团结和高度的敌忾。没有群众的团结、清明的政治，可以自由地发扬的民众的力量，全国人民全副心肠的支持，别说靠友邦的援助，就是自己能够生产多数而优良的武器也不能有胜利的把握，大家‘不要忘记全国人民的力量这一个最可靠的武器’”^[6]。

夏衍通过这些篇幅精简短小的文章对消极抗战的投降主义人士给予批评，对为建立统一战线所做的努力和奉献的爱国人士给予赞扬。“《大众生活》很快在素有小报传统的香港打开了天地，销量达十万份^[7]。”正是《大众生活》和《华商报》文艺副刊的紧密合作，为唤醒香港各个阶层的民主爱国人士、策应内地与香港的战事、传播无产阶级文艺提供舆论空间，初步建立了战争时期的文艺统一战线。

二、在文学创作中传播无产阶级文艺思想

1941年《大众生活》（香港版）开始连载夏衍的小说《春寒》，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大众生活》被迫停刊而中断^[8]。夏衍创作这篇小说是为了：“《大众生活》登完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腐蚀》后，因为编委中除茅盾外只有我一个算是搞文艺的，邹韬奋硬要我写一篇连载小说。于是我写了一生中唯一的中篇小说《春寒》”，“小说没有写完，香港就沦陷了，《春寒》的后半是我回到内地后才续完的^[9]。”

《春寒》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41年，当时日军攻占华南，广州文化界人士纷纷撤退，其中包括流亡女学生吴佩兰和留日回国的大学生徐璞，两人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并最终上升为朦胧的爱情。在广州沦陷前后，面对岌岌可危的广州，文化界社团、机关团体的爱国人士分批撤退至四会、曲江等地区，深入桂林、粤北、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在大片的华南区域保留了有生力量投入抗战。小说提到了青年戏剧演出团体的救国行动，是抗战爆发以来轰轰烈烈的华南戏剧运动的真实写照。

……青年人带来了兴奋，也带来了工作。曲江，立刻热闹起来了，漫街遍野，不论是在日间，还是在夜间，不断地荡漾着悲壮声，“春季歌咏大会”，“各团队联欢晚会”，“军民联欢大会”，多样的红绿招贴

在路上出现了……^[10]这段描写与夏衍在总结抗战三年来的戏剧中提到的：我们希望有成就的年轻剧作家，还偏爱着出奇的路，所描述的剧院情形基本吻合^[11]。

一个从重庆回来的朋友带给我的，他们油印了也不多，一出，就抢完了好，密司吴，依老徐的话先借给你，你读完别借给别人，亲手还给我！佩兰用一种好奇而又虔敬的心情接过来。在黯淡的灯光下，在那被手指染脏了的封面上，看见了《新阶段》这三个蓝色的铅字。这本薄薄的一百页的小册子，肃清了整个战区，大半个中国的悲观情绪。天真乐观地笑，重新在年轻人脸上出现了。“心的太阳”他们将这本小册子取了个衷心地赞叹的名字从这个人的手传到那个人的手里。饥渴地读，会心地笑，迸发般地欢呼，讨论大纲抄出来了。钢笔在蜡纸上发出春蚕吃叶的声音，在暗淡的灯光下，油印本一种种地印出来了。有的歪歪斜斜地模仿着这位他们所崇敬的作者的签名，有的偷出一点工夫，用两色套印的笨拙而工细的图案，来装饰这本书的封面。在街头，在小饭馆，在有几个青年人集合的地方，这本书变成了主要的谈话中心：

“看完了没有？”

“看完了没有？笑话，告诉你，三遍，一个字不漏地看过三遍了。”“不稀罕，看过五遍的多得很，昨天我们的工作会上，有人可以整段地背出来了。”

除了小说，夏衍还尝试电影剧本的创作。1941年夏衍经过香港时与老朋友司徒慧敏遇见，两人早在上海便已相熟。久别重逢的两人相谈甚欢，司徒慧敏央求夏衍在短时间里能够写出一个反映战争的剧本来，哪怕是故事梗概也行。夏衍回应：“却情不过，再则对久违了的剧本创作跃跃欲试，便答应了下来^[11-12]。”创作人物是否需要现实的生活是夏衍一直思考的，带着这个萦绕在脑海中的问题，他回到了桂林。不久，夏衍递给司徒慧敏一个名为《大地交响曲》的文学剧本（拍摄时改名为《白云故乡》）。大致讲述广州大轰炸时，在战争动荡的岁月两位青年分别与陈芬相识并相爱，他们参加抗日，白侃如知趣地退出这场三人错乱的关系。林怀冰被一日本女特务诱惑无意中泄露了军火仓库的情报，造成了部队的损失。醒悟后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军阵地炸毁敌人军火库，最后望着国旗倒在血泊中。夏衍借《白云故乡》批判了抗战爆发以来小资产阶级的消极抵抗思想，重点突出了知识分子青年在战争中迅速成长蜕变，描绘了抗战初期华南地区的现实状况，再现了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自发组织救国运动的场景。《白云故乡》作为抗战期间香港进步电影人拍摄的影片，有香港小贩义卖的情节，惨烈的战争场景以及触目惊心的街头实况。影片在香港放映时：“连映18天，票房收入创彼时香港电影的最高纪录，广州各大学校长及文化教育界撰文公开推荐该片^[13]。”

三、从《茶亭杂话》到《蜗楼随笔》的现实主义批判转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夏衍受命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工作委员会委员、南方分局（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于1949年2月改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员、香港文委书记。离开南京的时候，周恩来电告方方、林平：夏衍受特务注意，我已着他到香港，由他向你们转告中央关于南方统战、宣传^[14]。夏衍一到香港，随即加入《群众》（香港版）文艺栏的编辑工作，开设专栏撰写时事评论文章。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署名编辑兼发行人潘梓年的机关刊物——《群众》1947年1月在香港创办，目的是开展中国共产党对海外的宣传工作，“华侨是真诚爱国的，他们时刻关心着祖国，之前报道祖国真实情况的民主报纸在不少侨胞中受到冷遇，就是因为他们生平未踏国门一步，而衷心又不希望热爱的祖国真有这样不愿意听的丑恶现象的缘故^[15]。”由此，香港文委期望通过舆论影响争取更多的海外侨胞。

《群众》（香港版）于1947年8月28日出版办至1948年11月25日第143期停刊，夏衍以汪老吉、任晦之为笔名在该报专栏《茶亭杂话》（后改为《蜗楼随笔》）发表随笔文章。内容涵盖了解放战争以来的现实问题思考、面临的国际形势、国共两党的发展态势、时政要点回顾。通过这些文章，夏衍表露出他的深邃识

见，对战争的思考，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与当局统治的揭露，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在他看来，这些“讽刺文章，不堂皇更不冠冕，掷地亦无金石声，但其为用，却在对于‘说理’文章常常采取默杀乃至不看主义者，可以使他们骤然觉得有点刺痛”^[16]。

翻阅夏衍在《茶亭杂话》撰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向香港的读者在第一时间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状况、内地解放战争形势、官兵的讯息以及共产国际的声音。如介绍人民解放军的作风和纪律：过去的1948年实行了“三查”“诉苦”等新式的整军运动以后，最近部队里的民主作风更有了新的创造。在政治上评党员、评干部、实行普遍的民主批评；在军事上从评功过、评伤亡，更进一步，普遍地实行战评和用“想办法会”来集中战士；在经济上每班每班选出经济委员，管理账目，防止贪污，这样就达到了部队的更加团结，和战斗力的更加提高，这是军队中“敢于实行民主”的一个大胆尝试，也可以说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辉煌的业绩^[17]。也介绍了解放军在华东和华北战场上的攻势，陈毅将军指挥着华东解放军在八天内解放了济南。夏衍认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人民战争与反人民战争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非正义反人民军队内部必然会爆发的沮丧和阵前叛变，解放战争进入到决定性的第三年，这个因素已经从内部酝酿发展到表面爆发了。外压加强，内溃加速^[18]。”除了国内战场的消息，夏衍还刊发了同盟国苏联方面的消息。“人民经济委员柴维列夫报告：战后的苏联经济没有垮掉，本年总支出三千七百亿卢布，总收入预估四千二百亿卢布，收支相抵有余四百亿卢布。当整个世界淹没在赤字预算大灾难中，苏联这个不仅没有赤字而且还有剩余的国家似乎不能不说是个奇迹！”^[19]

四、结语

作为文化资本再分配的知识分子实践者，夏衍在1937-1945年间的香港殖民都市语境中，通过编纂文艺副刊（《华商报·灯塔》）、创作具象化抗战叙事的报告文学（《春寒》）、生产具有召唤结构的时政评论等复合型文化实践，成功建构了跨阶层的文艺统战阵地。他通过编辑副刊栏目，打破精英/大众的文化区隔，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并借助跨小说—新闻—评论的互文性生产，在都市市民、流亡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之间建立情感认同，将香港从殖民文化飞地转化为左翼话语传播的枢纽节点。夏衍通过媒介动员建构文艺统战网络，不仅印证了战时中国“艺制度现代性”在地化实践的复杂性，更为理解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文艺的跨区域流动提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 [1] 夏衍. 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懒寻旧梦录[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242.
- [2] 颜同林. 《华商报》副刊与1940年代港粤文艺运动篇[J]. 广东社会科学，2019（2）：104-112.
- [3] 《大众生活（香港版）》[N]. 1941.
- [4] 夏衍. 关于新闻的随感——纪念九一记者节[N]. 大众生活（香港版），1941（16）.
- [5] 夏衍. 忧与乐[N]. 大众生活（香港版），1941.
- [6] 任晦，夏衍. 新唯武器论[N]. 大众生活（香港版），1941（15）.
- [7] 周惠斌，邹韬奋. 在香港复刊《大众生活》[N]. 中华读书报，2010（14）.
- [8] 从1941年10月04日至1941年12月6日，《大众生活（香港版）》连载了夏衍中篇小说《春寒》。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大众生活》被迫停刊，小说更新到第十二章：蔡洁被反动派通缉，匆匆与吴佩兰告别一幕。
- [9] 夏衍. 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懒寻旧梦录[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244.
- [10] 夏衍. 夏衍全集·文学（上）[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172.
- [11] 夏衍. 夏衍全集·文学（下）[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112.

- [12] 司徒慧敏. 风雨同舟六十年——学习夏衍同志的创作道路[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9: 284.
- [13] 卢玮銮, 郑树森. 中国电影之出路 沦陷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M]. 香港: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17: 281.
- [14] 余慕云. 香港电影史话(第3卷)[M]. 香港: 香港次文化堂, 1998: 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版)[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707.
- [16] 任晦之(夏衍). “讽刺”之为用[N]. 群众·蜗楼随笔. 1948(36).
- [17] 任晦之(夏衍). 暗潮汹涌 收录其文集[N]. 群众·茶亭杂话.
- [18] 任晦之(夏衍). 外压与内溃[N]. 群众·蜗楼随笔. 1948(38).
- [19] 汪老吉(夏衍). 光明在东方[N]. 群众·茶亭杂话. 1948(39).